

论《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

钱志熙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旧题后村先生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在编者与选本的价值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对该书与刘选唐宋绝句六种的关系的分析,认为其是在刘选六种的基础上选编的、反映江湖诗派后期诗学观念的一个通俗性唐宋诗选本,其对后世影响最大,为后来的《千家诗》继承最多的是七言绝句一体。《千家诗选》可以视为南宋后期以江湖诗派为主流的诗坛对唐宋诗史的一次集体性的重新建构,对于认识南宋后期诗史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宋诗的诗史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还分析了江湖诗派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变化,指出《千家诗选》与四灵派的诗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对刘克庄的诗学思想也有较多的涉及。

关键词: 《千家诗选》;刘克庄;江湖诗派;南宋后期诗歌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摇摇文献标识码:** A **摇摇文章编号:** 1000-5919 (2013) 02-0072-12

摇摇《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下简称《千家诗选》)是宋末成书的一部规模较大的唐宋人诗选,其诗歌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虽然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至于其在诗歌史研究方面的价值,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这与学者多视其为坊间选本有一定的关系。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更、陈新两位先生校证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以下简称《千家诗选校证》),不仅纠正了清代流行的曹寅《楝亭十二种》中的《千家诗选》及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曹本排印出版的《后村千家诗校注》本的许多错误,而且依据《全宋诗》对本书所收选作品的作者、题目、文本做了详尽的考证,为后人继续研究本书或利用本书研究相关的文学史与文献学方面的问题提供很大的便利。两位先生还对该书的编者、成书与版刻时间做了十分全面的研究,其观点主要集中于《千家诗选校证》卷首《点校说明》和书末所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其论定此书元刊本署名“后村先生编集”为坊间假托,此书是依据当时流行诸种总集、别集、类书编纂而成的看法,也基本上可视为定论。但是,对于此书刘克庄的关系,两位先生持

《千家诗选》与刘克庄所编诸种唐宋绝句选绝无关系的看法,又有将一个复杂现象做简单判断之嫌。另外两位先生认为《千家诗选》本身价值不高,对于了解南宋后期的主流诗学参考价值不大。对此笔者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千家诗选校证》在文献整理与考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对于一个古代文学总集,文献的研究是不能代替文学研究的,单纯依靠文献研究,也形成不了有效的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方面的结论。《千家诗选》在唐宋诗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概括地说,它可以视为南宋后期以江湖诗派为主流的诗坛对唐宋诗史的一次集体性重新建构,对于认识南宋后期诗史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鉴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在李、陈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千家诗选》特点与价值重新进行论述,讨论的核心则是此书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

—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每卷之首标“后村先生编集”字样。古人对此多存而不论,也有学者提供证据来属实它的,如阮元《四库未收

书提要》:“宋刘克庄撰。克庄有《后村集》五十卷,及《诗话》十四卷,《四库全书》已著录。兹其所选唐宋时贤之诗,题曰后村先生编集者,著其别号也。是书向来著录家所未见,惟国朝两淮盐课御史曹寅曾刻入楝亭丛书中,前后亦无序跋。案《后村大全集》内有《唐五七言绝句选》及《宋五七言绝句选》、《中兴五七言绝句选》三序,或钁板于泉、于建阳、于临安,则克庄在时固有选诗之目。此则疑当时辗转传刻,致失其缘起耳。书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门,每门附以子目,大致如赵孟奎《分类唐诗歌》;所选亦极雅正,多世所脍炙之什。”是其书为刘克庄所编,阮氏未曾置疑。并且对其在选诗方面的眼光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与他认为此书是刘克庄所编有关系。今人陈增杰先生也认为:“整理出版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下简称《后村千家诗》)这样一部古代重要的唐宋诗选本,除了可从中欣赏唐宋诗佳作和探索刘氏的诗学观点以外,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是该书所具有的丰富的资料价值。”^①也是承认本书为刘克庄所编集,并对了解唐宋诗歌艺术精华与探索刘氏诗学观点有参考价值,其观点与阮元是接近的。但近人缪荃孙在为本书的元刊本作跋时,认为“《后村大全集》所载唐贤诗选、唐贤诗续选、宋贤诗选、近贤诗后选均与此不合,不必强为附会。”对此书旧题后村编集提出质疑。^②此书旧所流传者为曹寅《楝亭丛书》本,不是最理想的本子。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更、陈新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日本斯道文库所藏的元刊本为底本,参以多种版本,并依照全书考证、校对,在研究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所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一文,继缪氏之后对此书为“后村编集”之说进一步提出

质疑。其具体结论是这样的:“基于《诗选》与材料来源、实际编者身份和成书刊刻过程,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这部书的价值定位。即:这部书不仅与刘克庄无关,也并非来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之人,只是由民间的普通文人依据市面上常见的各种资料分类汇编而成,被建阳、麻沙一带的书商刊行的。当时,其所对应的读者层面是民间学童和一般知识分子,而不为文人学者所重,这也正是这部书成书以来长期不见于著录,几乎湮没无闻的原因。由于其编者在学识上存在不少缺陷,对所用资料不具备足够的识别能力,编纂态度也不够严谨,其内容的可靠性存在很大问题;同时,在作品选录方面很难说存在明确的诗歌艺术标准,对考察南宋后期的诗歌发展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这一点是今天使用此书时,不论做文献整理或文学研究,都必须注意的。”^③两位先生对该书的版本、编者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像《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这样书,其在编者与出版方面的情况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一些普通被认为是托名之作的书籍,其与被托名者的关系,更是十分复杂。比如同样存有元刊本的王十朋的《王状元集注东坡诗集》,向来被认为是托名之作,但近来的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其确为王十朋本人之作^④。《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刘克庄的关系,与刘克庄是否此书真正意义上的编者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该书虽然有可能是坊间编集的以射利为目的的作品,但托名刘克庄并非毫无依据,它极有可能是在刘氏的几种唐宋诗选本的基础上编集的。

要探讨《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还得从刘克庄所编的六种唐宋绝句选说起。六种诗选虽然原书迄今未

① 陈增杰《对〈后村千家诗校注〉》的意见,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6期,收入《陈增杰集(温州学人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312页。

② 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元刊本缪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7页。

③ 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第906页。

④ 李晓黎:《因为睫在眼前长不见——王十朋为〈百家注东坡诗〉编者之内证》,《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2期。

见,今刘克庄的集子里完整地保存了六书的题序,提供了许多关于原书的信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对它们作出判断,用来与《千家诗选》相比较。

刘氏这六种诗选分别为《唐五七言绝句》、《本朝五七言绝句》、《中兴五七言绝句》、《唐绝句续选》、《本朝绝句续选》、《中兴绝句续选》。这六种绝句选,其中前三种,在南宋淳祐六年(1246)前后曾钐行于泉州(莆田)、建阳、杭州三地,后三种成于南宋宝祐丙辰(1256)前后,依情理也是钐行于世的。六种诗选的情况是这样:初选唐人五、七言绝句各百首,再选南渡前即北宋人五七言绝句各百首,复选中兴以后即南宋时期的五七言绝句各百首。这是刘克庄选诗工作的第一期,共选绝句六百首。到了十年后,因为听从论者认为其选诗太严,又编《唐绝句续选》两百首,其中七言一百首,五言七十首,六言三十首。《本朝绝句续选》也是这样的数目。《中兴绝句续选》则是七言一百首,五言六十首,六言四十首。这是刘克庄选诗工作的第二期,亦是共选绝句六百首。本期的特点是加选了六言绝句,克庄自认为是一个创举。其言曰:“盖六言尤难工,柳子厚高才,集中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补阙所作绝妙。今古学者所未讲也,使后世崇尚六言,自余始,不亦可乎?”^①总结地说,刘克庄共选唐代、北宋、南宋绝句一千二百首,三期中每期各四百首,这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唐宋绝句精选本。

现在再看《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六种绝句选本(以下简称“刘选六种”)同异及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第一,《千家诗选》继承了“刘选六种”的分期方式,其将所选诗人分为“唐贤”、“宋贤”、“时贤”三类,正是刘克庄“唐人”、“本朝”、“中兴”三期的沿用。而且在选目上,《千家诗选》也基本上是沿承刘克庄三期鼎足三分的做法,只是南宋部分的数量更加突出。这种分期的方式,决非坊间浅识者所能确定,而是与以刘克庄为代表的江湖

诗派的诗史观念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在后文还是要专门讨论。但在具体的归属上,除了“唐贤”与刘克庄说的“唐人”完全对应外,“本朝”在刘克庄那里,是指北宋即南渡以前。而《千家诗选》的宋贤虽然也是以北宋为主,但加入部分的南宋人。这一点,李更、陈新两位先生也是注意到的:“刊印牌记中所谓唐宋时贤五七言诗选,似乎应指上文所述六种唐宋绝句选本而言。从道理上讲,这六种选本是以初学者为对象的,其他人汇集合编,也确实可以成为与《诗选》类似的选本,但考察收录作品的时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即三种绝句选所涵盖的‘唐’、‘本朝’、‘中兴’三段并不等同于《诗选》的‘唐贤’、‘宋贤’、‘时贤’。据刘克庄为各种绝句选所作的序文,《中兴五七言绝句选》、《中兴绝句续选》收录至其祖辈或父辈,大体以江西诗派、永嘉四灵为下限,而这些诗人的作品在《诗选》中则基本都被编入‘宋贤’部分,因此可肯定《诗选》并非直接以六种绝句为资料基础分类编纂的。”^②李、陈两位先生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能作为此书不是以“刘选六种”为资料基础的依据,更不能据此而论定此书与“刘选六种”毫无关系。但《千家诗选》在确定“宋贤”与“时贤”的界限时,基本还是以北宋诗人为“宋贤”、南渡以后为“时贤”,如朱淑真就是南北宋之际的人。另外如卷一浙江黄岩人左纬,就是一位与许景衡同气的诗人,约生于哲宗元祐初,高宗建炎年间尚存世。^③可见《千家诗选》基本上还是沿用刘克庄将宋诗分为北宋与南宋两段的标准。《千家诗选》的唐贤、宋贤、时贤三分法,完全是依照后村唐人、本朝、中兴三分法而确立,其中反映南宋后期诗人的诗史分期标准。这是其渊源于“刘选六种”的重要迹象之一。只是《千家诗选》编者的时间更晚,所以在时贤与宋贤的区分上,将宋贤的下限由南渡以前移至南宋中期,将南宋江西诗派成员与永嘉四灵都归入宋贤之中。而时贤的上限则为南宋后期,亦即戴复古、刘克庄及其追随者,也就是江湖诗派的

①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十七《唐绝句续选》,第4085页。

②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第886页。

③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本书所涉诗人传略”,第928页。

成员。

第二,“刘选六种”只选唐宋人绝句,未选律诗。《千家诗选》则包括了除排律外的近体各种体裁。这是两者的一个不同之处。但是从集中所选各体的比例来看,绝句远多于律诗,并且所选绝句精华程度远过律诗。这种情况,是可以作为《千家诗》与“刘选六种”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重要证据。也就是,《千家诗选》中的绝句部分,主要是采自“刘选六种”。而律诗部分,则可能是编者依据其他的总集与类书增加的。同时,在选律诗时,编者又采用了“刘选六种”的分期方法。可以说,“刘选六种”是《千家诗选》的主干部分。正是在这种理由下,加上商业上借重金人的考虑,编者就将全书的都冠以“后村先生编集”的名义。但在各体诗数量比例上,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本书七言多于五言。在绝句方面,七言绝句多于五言绝句。这当然也与“刘选六种”原来的比例有关,“刘选六种”第一期各书完全是五、七言数量对等,即五七绝句各为三百首。第二次增入六言绝句一百首,这个增加数量是以减去五绝一百首为前提的。所以,在“刘选六种”中,五言就少于七言。不仅如此,可能在移入“刘选六种”的五绝时,《千家诗选》还做削减的处理。这是合理的,其实刘克庄选唐宋绝句,各期都五七言均等,只造成形式上的平衡。从实际的诗体发展情况来讲,是不合理的。因为从绝句发展来讲,五绝起源最早,南北朝时期庾信、王褒等人就已有成熟风格的作品出现,至盛唐达到最高水准,中晚唐有所变化。宋人的五绝,无论在各体中的比重还是艺术质量上,都无法与唐五绝相比,也远低于宋人的七绝。所以《千家诗选》中宋人五绝减少,应该说是“刘选六种”的一个合理的改编。到了署名谢枋得、王相的《千家诗》,五绝一体全用唐人,并且以初盛唐五绝为主,这虽然又走向片面化,但却是对五绝一体本身发展历史的比较准确的呈现。可见,从“刘选六种”到《千家诗选》再到《千家诗》,其间不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反映从崇江湖诗派的诗学到后来元明学唐、崇唐的明代复古派诗学的演变轨迹。这也说明向来只被视为通俗

选本的《千家诗》系列书本,其实对于研究诗歌史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至于“刘选六种”的一百首六言,本来就是刘克庄个人独到的审美趣味的体现,作为一个比“刘选六种”更为面向通俗的选本,《千家诗选》加以剔除,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六言的创作规则及奥妙,并非初学者所能轻易掌握。

第三,《千家诗选》与“刘选六种”都是带有童蒙读物的性质,但在标准上又是精选性质,并且反映了流派的宗旨。刘氏《唐五七言绝句》自叙其选诗之由,是因为有感于洪迈《唐人绝句万首》之数量过大、精芜不分,因“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选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本朝五七言绝句》又说:“《唐绝句诗选》成,童子复以本朝为请。”日本御茶水大学图书馆藏成策堂文库元刊本《千家诗选》目录之前的刊印牌记:“今得后村先生集撰唐宋时贤五七言诗选,随事分百有余类,随类分唐、宋、时贤三家,总是题咏,无一闲话,真诗中之无价宝。不惟助骚人之唱和,亦可供童蒙之习读,故名曰《千家诗选》。同辈有志于斯,为之一览,使余无抱璞之恨。”^①其宗旨在于精选,以童蒙为对象,同时也对一般的诗人有借鉴之功。

第四,《千家诗选》与后来流行本《千家诗》其选诗都是以雅俗共赏为特点,对于过于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及文化功能如载道、讽喻等因素过于强的作品并不重视。也就是说,他是以一种比较纯粹的艺术趣味来选诗,这种艺术趣味,刘克庄称为“切情诣理”。《唐五七言绝句选》对此有明确的表达:“切情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弃。否则,巨人作家不录也。惟李杜当别论。童子请曰:‘昔杜牧讥元、白海淫,今所取多边情、春思、宫怨之什,然乎?’余曰:‘《诗大序》曰: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古今论诗,至是而止。夫发乎性情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礼义者,圣笔不能删也。小子识之。’”后人所说“千家诗体”,正是根植于刘克庄这种选诗标准。这种选诗标准,可以说是以唐律为基本的艺术标准,剔除生硬、晦涩、奇崛、拗峭等各种风格流弊。这不仅是“刘选六种”的艺术标

① 《汾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第885页。

准,也是自永嘉四灵至江湖诗派的近体诗创作原则。

第五,“刘选六种”及刘氏其他评选,在《千家诗选》中有所反映。其《唐五七言绝句》一文即云:“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选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弃也。否则,巨人作家不录也。”^①又其《宋氏绝句诗》说到他选唐绝句时“元白绝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窦氏兄弟曰群、曰牟、曰巩,所作极少,然皆可存。”^②今存《千家诗选》白居易诗所选极少,其中卷九《莲花》五绝一首(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卷十六《宫殿》七绝一首(文昌新入有光辉,紫界宫墙白粉开。晓日鸡人传漏箭,春风侍女护朝衣),卷二十三唐贤《美女》七绝一首(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寒地莲。何处闲教鹦鹉女,碧纱窗下绣床前),卷二十四《茶》七绝一首(红纸一封书后信,绿牙十片社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轻下刀圭扰麴尘),后集卷一《值中书省》七绝一首(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卷六《钱代内子贺兄嫂》七绝(刘刚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刘克庄《宋氏绝句诗》说白居易绝句止取三、二首,是指第一期选,第二期又《唐人五七言绝句续选》到底选了几首,不得而知,应该也是三、二首。但从上面《千家诗选》共选白氏五七言绝句六首看来,与刘氏《唐人五七言绝句》、《唐人五七言绝句续选》的数选白氏绝句数量,可说合若符契。至于元稹的绝句,刘氏第一次只选其五绝一首,第二次有否选录不得而知。数量极少,《千家诗选》元稹各体诗一首未选,明显看出受刘氏对元白评价过低的影响。至于刘克庄赞扬的窦氏兄弟,今存《千家诗选》卷六选窦巩《秋夜》七绝一首(护霜云映月朦胧,乌鹊争飞井畔桐。夜半酒醒人不觉,满池荷叶动秋风),后卷三窦巩《寻道者所隐不遇》(据李、陈二位考证:又作于鹄诗)(篱外涓涓涧水流,槿花半照夕阳收。欲题名字知相访,又恐芭蕉不耐秋),比刘氏所选

窦家兄弟绝句为少。但注意到窦氏,可能还是直接受刘克庄的启发。后来的《千家诗》七律卷中选窦叔向《表兄话旧》一首,仍然可能是沿着后村的选诗的线索而来的。即后村对窦氏的推崇,可能间接地影响到后来《千家诗》对窦叔向作品的选录。可能正是沿承刘选《唐五七言绝句》的观点。刘氏另有《宋氏绝句诗》称“金华宋吉甫,祖子孙三世八人,所作诗何翅万首?或者止摘取其绝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又曰“它日宋氏此编必传,谈者必曰:后村眼毒。”今检《千家诗选》有可能属于金华宋氏的,据李更、陈新二先生《本书所涉诗人传略》“宋自适,字吉甫,金华人。真德秀曾为其诗集作跋。”“宋自逊,字谦父,号壶山,与江湖派诗人曾原一等有交往。”宋自适诗《千家诗选》后集卷四载其七律《寿黄御史》一首,卷九选其七律《谢人馈药》一首。宋自逊诗《千家诗选》卷十选七律《桂华》一首,七绝《五月菊》一首(东篱千古属重阳,此本偏宜夏日长。会得渊明高卧意,故来同占小窗凉),卷十一七绝《种柳》一首(短斫深煨倒插宜,明年便有绿垂垂。只因造化大容易,不见岁寒冰雪时),七绝《萍》(苦无根蒂逐波流,风约才稀雨复稠。旧说杨花能变此,是他种子已轻浮),卷十三《夜雪》(雪眼羞明夜转飞,梅花未觉竹先知。一炉柴火三杯酒,谁记山阴有戴逵),卷十七七律《茶磨》一首,卷之二十《蚊》七绝一首(朋比趋炎态度轻,御人口给屡憎人。虽然暗里能钻刺,贪不知几竟杀身),其中所选的宋自逊的绝句甚多,与后村摘选的《宋氏绝句》本,应该也有渊源关系。

就《千家诗选》的最后成书面貌来看,刘克庄并非真正的编者。这一点,原书的刊印牌记中其实已经交代得很清楚:编者是从刘克庄的家中得到刘氏五七言诸选本,加以并编集,并冠以《千家诗选》的书名。所以这本书,事实是刘克庄与这位编者的合作成果,但出于对刘克庄的尊重,或者发行量方面的考虑,直接冠以“后村先生编集”,这其实不算是毫无关系的假托。牌记即为这位编者所写,他即是使“余无抱璞之恨”的“余”。可见

①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十四,第4004页。

②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百零一,第4221页。

作者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是《钁家诗选》的真正编者的事实。至于这位作者的身份,也不是一般的书商,从其感慨以言,号召同志关注此书的情况来看,它是稍后刘克庄的江湖诗派中某一成员所编,这一成员的身份,与编《江湖小集》的陈起应该是最相近,即他是一位以贩诗为业的诗道中人。江湖派中诗人,都是沉沦江湖,寄食官商之家的下层文士,他们一方面写诗,同时也以诗歌写作为生涯的职业。其中一些人如陈起,也经营书业,合书商、诗人、江湖之士为一身。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即以刘克庄本人而言,其生平编选的六种绝句,虽然说是为了家塾课童而编,但在泉州、建阳、临安钁行,当然也具有了贩诗为业的性质。江湖诗派的另一巨擘戴复古在《巾帔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全宋诗》卷2813,第33465页)一诗,也明白地说自己以诗谋食:“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平生知己管夷吾,得为万贡堂前客。嘲吟有罪遭天厄,谋归未办资身册。鸡林莫有买诗人,明日烦公问蕃舶。”戴氏所说的“落在江湖卖诗册”虽然不能直接理解为他拿着一首一首诗来卖。但从他坦言卖诗册的说法来看,当时真有一些江湖诗人,是以编书、贩诗为生的。

二

《钁家诗选》与江湖诗派的关系之密切,是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来的。书中称之为“时贤”的这一部分诗人,主要是江湖诗派的一些诗人。这一点李更、陈新两位先生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一文中已经指出,他们认为“这部分作者的主体是江湖诗人和南宋中后期活跃人物,虽然不少人的生卒年无法确知,甚至有些已是生平无考,但在大体上仍可看到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如果借用《全宋诗》来考察,在有生平线索可查的作者中,除部分南宋中期人物,如杨万里、范成大等人以外,大部分集中在第五十一至六十二册之间,即生年约在1155—1205的四五十间,主要活动在理宗朝的一代人。”^①江湖诗派的

形成,学术界的基本判定标准是以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陈起编《江湖集》为重要的线索。一种看法是以《江湖集》的出现为基点向前追寻,根据《永乐大典》引录《江湖集》中的一些诗人,生活在南宋前期。一种看法是以尤、杨、范、陆四家的全部离去为江湖诗派的上限,张宏生先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即将江湖诗派的形成上限定为嘉定二年(1208)。^②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参考的。但是,确定江湖诗派首先应该寻找此派的重要特点,此派显然不是今天意义的有严格的组织形式的文学团体,因此成员的界限是相对的。但是,此派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江湖诗派成员的主体是由一些处于官僚体制的低层的、带有明显的在野派特点的士人构成的,他们主要分布在浙、闽、湘、鄂一带。在活动方式上,带有游士、“谒客”^③的特点。这种情况,即当时人常说的“江湖”、“江湖诸人”、“江湖诗客”。第二,江湖诗派与前此江西诗派及南北宋诸大家的不同,是在于诗歌体裁与风格上,承继四灵派的唐体、唐律。刘克庄的诗句:“旧止四人为唐体,今当天下话头行。”这种“天下话头行”的以近体诗为主要体裁的创作风气,正是江湖诗派的基本特点。由此可见,江湖诗派的出现,应该是在四灵诗风流行之后。江湖诗派的早期与永嘉四灵有密切关系。四灵中徐玑、徐照去世稍早,与江湖诗人没有太多直接接触。赵师秀、翁卷,与江湖诗派的两大领袖戴复古、刘克庄都有交往,并且有社友的关系。刘克庄《仁戴诗卷》提供江湖诗派早期活动的重要线索:

余为仪真郡掾,始识戴石屏式之。后佐金陵阊幕,再见之。及归田里,式之来入闽,又见之,皆辱赠诗。式之为大诗人,然平生不得一字力,皇皇然行路万里,悲欢感触,一发于诗。其侄孙颐,囊其遗稿示余。追念曩交式之,余年甫三十一,同时社友如赵紫芝、仲白、翁灵舒、孙季蕃、高九万,皆与式之化为飞仙。

①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第904页。

②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页。

③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对江湖诗人的“谒客”特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应该说,刘克庄称为社友的这些诗人的交游唱和,正是江湖诗派形成的标志。克庄初交复古时年三十一,正当嘉定十年(1217)。其交翁卷等人的时间,或更早。所以,比较稳妥的说法,永嘉四灵诗风的真正流行与江湖诗派的初步形成,应该是在开禧、嘉定时期。这个时期,江湖诗人群形成了引人瞩目的规模,而专擅近体的风气也在诗坛盛行。《千家诗选》所反映的正是从四灵诗风流行到江湖诗派风行天下这一诗歌史发展阶段的诗坛风气。

对于江湖诗派的形成与发展的阶段性,其实还是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的。如果将四灵与江湖诗派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江湖诗派在发展上也是情况很复杂。这种复杂的表现,也许可以这样说,江湖诗派是直接由永嘉四灵诗风发展过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又有一种改正、甚至否定和遗忘四灵诗风的现象。江湖诗派的主要人物刘克庄,在其创作发展的中期,就曾试图超越四灵,从广阔的诗史背景中重新寻找渊源,其之所以能取得差不多能与前面的唐宋诸大家接□的艺术成就,也是与其中年的重新寻找传统分不开的。这种重新寻找传统在江湖诗人中并不鲜见。如江湖诗人陈必复自序其《山居存稿》:“余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新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要皆自成一派。及读少陵先生集,然后知晚唐诸子之诗,尽在此矣,所谓诗之集大成者也。不佞三熏三沐,敬以先生为法。虽夫子之道不可阶而升,然钻坚仰高,不敢不由是乎勉。”^①与这种向高境界追求、重新寻求传统相对的是,一部分戴、刘的后学与敬仰者,则是以戴、刘为楷模,差不多是忘却了永嘉四灵的存在。

上述这种情况在《千家诗选》的五律选录方面反映出来了。本书的五七言律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五律远少于七律。这个现象初一看,跟江湖诗派的创作现象很不一样。江湖诗

派源于永嘉四灵。四灵是唐律风气的开创者,但他们最多使用的是五律,并且以锤炼苦吟为特点,讲究警策之句,与晚唐贾姚、及宋初九僧等人一脉相承。刘克庄、戴复古等人早年受四灵的影响,主要也在五律方面,其风格与四灵接近。如刘氏《南岳集》中的五律,学习四灵苦吟、磨镌物象的特点很明显。如《北山作》“字瘦偏题石,诗寒半说云”^②、《早行》“渐觉高星少,才分远烧新”^③、《鬲岭》:“烧余山顶秃,潮至海波浑”^④等,置于四灵集中,不能分辨。但是这种磨镌物象、力求警策的创作方式,在《千家诗选》所选的五律中并没有反映出来。尤其是《千家诗选》在选四灵等人诗时,也并不选这类最能代表四灵风格的五律诗。这里面其实反映江湖诗派在发展后期上诗风的一种变化。这与刘克庄仍有一定的关系,刘克庄后来对四灵的专以五律见长的作法是有所批评的。其《野谷集·赵漕汝□》中就表达了这种意见:“古人之诗,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联一句擅名。顷赵紫芝诸人尤尚五言律体。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十字,更增一字,吾未知如何矣。’其言如此。以余所见,诗当由丰而入约,先约则不能丰矣。自广而趋狭,先狭则不能广矣。《鸛鹄》、《七月》,诗之宗祖,皆极其节奏变态而后止,顾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⑤《千家诗选》之少选五律,并且不选四灵一派风格的五律,正是与这种风气转化有关系。但这其实是一个选诗标准上的偏差,使得《千家诗选》在五律方面不仅选录作品数量少,而且质量偏低。所选的主要是戴复古、刘克庄一派的五律。如卷四“时贤·重九”所选戴复古《野中》:

独立秋风里,怅然思故乡。街头沽美酒,船上作重阳。萸菊一枝瘦,溪鱼三寸长。客中聊尔耳,亦可慰凄凉。

卷六“时贤·昼”所选的刘克庄《昼》:

① 《江湖小集》卷三十四《陈必复山居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本。

② 《刘克庄集笺校》第一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③ 《刘克庄集笺校》第一册,卷一,第8页。

④ 《刘克庄集笺校》第一册,卷一,第13页。

⑤ 《刘克庄集笺校》第一册,卷九十四,第3983页。

摇摇散怀轻病骨,汲古活心源。日炙桐阴晚,烟蒸豆穗繁。密红双鹭跂,深绿一鸥喧。未昼聊舒偃,茶香起小烟。

四灵之磨炼精警,语不轻出。戴、刘则转为巧于立意、长于叙咏,但风格转为浅切。至江湖后学,则每趋尖新,如卷一“时贤·春”赵信庵《春》:

檀板且教停,花妖不耐惊。日融莺语滑,风软蝶身轻。缕篆消春昼,游丝弄晚晴。谁家杨柳院,笑语杂棋声。

此种风格,距离四灵的苦思烹炼已经比较远,趋向于流易的作风。此集中所选许多朱淑真的五律,也是以新巧流丽为特点的,如卷四“宋贤·中秋”朱淑真之作:

光阴如撚指,不觉是中秋。欲赏今宵月,须登昨夜楼。露浓梧影淡,风细桂香浮。莫做寻常看,嫦娥亦解愁。

总之,从《千家诗选》中所选的五律来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江湖诗派后期诗风趋于流易,逐渐失去前中期注重苦吟烹炼的艺术作风。其所选的五律诗,“唐贤”极少,“宋贤”也不多,主要是“时贤”之作。这就离唐宋五律诗发展的实际的历史很远。五律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已有警策之作,至盛唐王、孟、李、杜、高、岑诸家,臻于全面成熟,晚唐贾姚一派以苦吟见长,下沿至宋初九僧、永嘉四灵。中间江西诗派的陈师道等人也以锤炼见长,但风格趋于奇崛古淡。《千家诗选》的五律部分,完全没有反映五律艺术的发展史,以至于后来的王相的《千家诗》在五律方面,完全不用《千家诗选》为蓝本,重新选录。反映明代复古派崇尚盛唐的趣味,以兴象高华的初盛唐五律为主。如果《千家诗选》的编选者能以晚唐体、四灵体为标准选录五律,就能选入不能轻易被淘汰的晚唐及四灵一派的五律精品,会使后来《千家诗》的面貌与现在流行的选本有所不同。

《千家诗选》是一个通俗的选本,但它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流行风气,也可以说是站在后期江湖诗派的立场上对唐宋诗名篇系列的一个重新排录,里面隐藏着江湖诗派所建构的唐宋诗史。从唐宋体裁发展的历史来看,江湖诗派本质上是一个近体诗派。自从永

明体产生之后,近体的艺术规范与审美标准就开始建立,并且实际成了后来唐宋诗艺术的一种核心性的标准。唐宋诗学中的法度论,就是其集中的体现,而苦吟、锤炼的作诗方法,也主要是在近体创作中明确起来的。就诗体来讲,近体也可以说是唐宋诗歌体裁系统的一个核心。与古体与乐府体总是需要通过对过去的艺术传统的学习与模仿来保持其艺术品格不同,近体具有一种在诗歌的风格、题材上不断地拓展的特性,甚至它的审美趣味也是不断地变化着的。所以,实际上近体引领着唐宋诗歌的发展历史,唐、宋的古体与乐府体也受着近体的深刻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接受近体的因素,还是有意与近体立异。但是就整个唐宋诗歌体裁的发展的情况来看,近体并没有达到独盛局面,在唐宋诗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支配诗歌创作的基本体裁观念,一直是尊古轻近。相反,近体偏盛的晚唐与晚宋,在正统的诗史观中,是不被视为唐宋诗的盛世的。从北宋到南宋前期,在诗歌体裁上的基本倾向,还一直是沿承唐代复古派的尊古轻近的观念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永嘉四灵以其专擅近体的创作实践做出实际上的体裁观念的革新。这种革新实践被叶适、刘克庄等人及时地总结出来,用唐律、唐体这样的概念将其明确化。应该说,这是从齐梁时期近体出现以来,对近体第一次做全面的肯定,并且做出理论上的阐述。尽管江湖诗派的作家,并不完全放弃古体与乐府体,而且仍受着唐宋诗学尊古思想的支配,有向古体与乐府回归的意欲,刘克庄本人就是这样。但是从实际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创作成就上,江湖诗派可以说是一个近体诗派。《千家诗选》大胆排除古体、乐府歌行之体,只选近体,虽然与他是一个面向童蒙与社会大众的通俗化选本有关,但与唐律、唐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唐体流行于天下的江湖诗学的局面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千家诗选》可以说永嘉四灵、江湖诗派依据唐律的概念对唐宋诗史的一次重构。

《千家诗选》是一个立足于当代立场的选本。这种大胆地立足当代,在通代的名作选本中大量选入当代作品的作法,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唐宋诗学的主流是复古诗学,对此江湖诗派实有

逆反的表现,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重今的诗派。当代作品的大量选入,即是其明显的表现。一般来说,诗选有通代与断代两种,断代中当代诗选、同人诗选又占很大的一部分。唐人选唐诗多为此种。宋人的诗选,多为通代,并且多带有经典范本的性质。这种选本,一般是以古人已有定评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为主的。《千家诗选》也是一通代的经典范本,但却大量选入还没经过时间考验与历史淘汰的当代人作品,尤其是刘克庄、戴复古以来的江湖诗派的作品,成为入选的重点。与江湖后学趣味最为接近女诗人朱淑真、方外诗人白玉蟾的大量选入,也是本诗选的一个特点。这只能有这样一种解释,即在江湖诗风越来越趋通俗流易、尖新奇巧的风气中,朱、白两位的诗歌在当时是极其流行的。他们不仅取代四灵的苦吟经典,也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戴、刘的经典地位。

《千家诗选》的另一特点,是消解向来注重的唐宋诗大家与名家的影响,以本书编者的趣味标准,选录了大量的非名家的作品。这是许多当代江湖诗人的作品得以入选的原因之一。其对传统的经典标准,是有所消解的。这与从永嘉四灵到江湖诗派的诗学趣味是分不开的。永嘉四灵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工于五律的晚唐的贾岛、姚合一派,戴复古《偈赵紫芝》称其“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葛天民《访紫芝与子舒集》“君参唐句法,亲得浪仙衣”,徐集孙《赵紫芝墓》“晚唐吟派续于谁,一脉已昌复已而”。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三称:“亡友赵紫芝选姚合、贾岛二家诗为《仁妙集》,其诗语往往有与姚贾相犯者。”除了贾、姚之外,张籍、王建也是这派诗人的重要学习对象,他们的特点是以平淡为旨,但重视锤炼,并且扫弃陈言,摘去书袋,不资书为诗。刘克庄《韩隐君诗》一文,就说后人之诗,多出于记闻、博识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如果说四灵之学晚唐,重在苦吟、锤炼,则江湖后学之学晚唐,则重在“切近”与“简便”。同时,不资书为诗,也是其重要的表现。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正是上述各种倾向中,对唐宋

诗史做出新的建构。相对于传统的诗史,这个以唐律,或苦吟锤炼,或切近简便为各宗旨的近体诗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传统与大家数的消解。因为不资书为诗,不崇博雅、汪洋恣肆,而唯重切近,唐宋的许多大家的诗学价值都被重新估定、甚至被消解。刘克庄本人就提出一种“本色”之论,以此来重新判断唐宋诗人价值:其《竹溪诗》一文云: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而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钜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坤间,艾轩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锻炼之功,有经岁累月缮一章而未就者。尽平生之作不数卷,然约以故繁,密胜疏,精掩粗。①

刘克庄的“本色”论,其实是以追琢磨炼以求诗语之工为宗旨的,并且摆落理致、辨博、材力诸种因素。唐宋诗的发展,是与唐宋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唐宋儒学的繁荣分不开的。所以唐宋的大家名家的成就,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还表现在其诗歌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蕴上。借助道与文的概念,派生道与诗关系,传统的文学思想,不仅有文以载道,也有诗以明道、诗以载道的表现。到了理学风气盛行的南宋前中期,诗与理学、经学及一般学术的关系联系十分密切。但在大部分的场合,诗的本色受到了侵害。所以,诗与书的关系,诗与理关系,在刘克庄、严羽他们这里都成为重要的问题。只是两家的理解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法也不同。刘克庄是总结了永嘉四灵、林光朝(艾轩)等人磨炼以为诗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以磨炼为本色的诗论。而严羽则借助禅学,提出以“妙悟”为本色当行的主张。一是从晚唐出发,一是由晚唐上升到盛唐。其所面对的都是当时诗学的基本问题。

《千家诗选》消解大家的做法,也可能直接受到刘克庄的影响。“刘选六种”基于刘克庄本人的诗学趣味,对诗史上的传统评价有所纠正。其中一个做法就是以其独具的标准选诗,不拘于大

①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十四,第3996页。

家与一般的诗人。其《唐五七言绝句》一文即云:“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选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弃也。否则,巨人作家不录也。”^①又其《宋氏绝句诗》说到他选唐绝句时“元白绝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窦氏兄弟曰群、曰牟、曰巩,所作极少,然皆可存”。^②这就是典型的消解大家的做法。对此上节中讨论《千家诗选》与“刘选六种”的渊源关系时已经分析过。

就刘克庄本人的诗学思想来讲,有一个从以崇尚晚唐、四灵到重新回归汉魏以来的文人诗大传统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不具体讨论。但是刘氏这种消解大家、消解唐宋诗学中文化承载的作法,对于当时的江湖诗派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大的。《千家诗选》立足于当代来重选唐宋近体诗代表作,正是上述诗学思潮的直接反映。这其中,消解大家,用后期江湖派“切情诣理”、切近简便的宗旨来对唐宋大家的作品重新进行挑选,这个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三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千家诗选》是南宋后期江湖诗学流行时期的一个唐宋近体诗选本,其中的五、七言绝句,是以刘克庄选的六种唐宋绝句为基础的,这是全书冠以“后村先生編集”的原因。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该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宋后期流行江湖诗风的产物,对于考察南宋后期的诗歌发展史,不是没有参考价值,而是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不仅署名后村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可以说是从四灵到江湖诗派这一诗歌史段落的直接反映,甚至后来流行的托名宋代谢枋得、明代王相所编的《千家诗》,也蕴藏着这一段诗史的重要的事实。即流行的《千家诗》是以《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基础上精编而成的,所以其实也蕴藏江湖诗派的审美标准,最明显就是这两本书都只选近体,几乎不选古体与乐府歌行,这是自四灵之后江湖诗风中盛行唐律(或称唐体)的风气的直接反

映。历来学者多已指出《千家诗》是在《千家诗选》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选而成。尤其是七绝与七律两体,《千家诗》与《千家诗选》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千家诗》七绝共九十五首,可确定为宋人之作的有五十九首。我们知道,“刘选六种”中,宋人七绝的数量就已两倍于唐人,《千家诗选》七绝中宋绝与唐绝的比例如何,我们没有具体的统计,但初步估计,宋人七绝的数量还要大,差不多是三倍于唐人。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千家诗》已经对宋人的七绝作了大量的删减,但由于原来的数量就大,所以结果还是宋人的七绝多于唐人七绝。传统的对七绝的看法,是以盛唐七绝为正宗的,王维、李白、王昌龄等盛唐绝句三大家及王之涣、王翰、高适、岑参等人绝句,在绝句的发展史上具有很高地位,也是历代绝句选本所重点选录的。《千家诗选》与这种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它是以中晚唐及两宋的绝句为重点。盛唐绝句以风神为主,但《千家诗选》则切情诣理、有指事造物之功的作品,其所选李白、杜甫、王维三家的七绝,多是此类。其中李白三首,《清平调词》“云想衣裳花想容”、《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黄鹤楼闻笛》“一为迁客去长沙”,王维一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杜甫三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漫兴》“肠断春江欲尽头”“糝径杨花铺白毡”。杜甫的七绝,向来被视为盛唐七绝的变体,但却是宋人七绝的重要学习对象,江湖诗派也不例外。所以在传统的评价中被视为变体的杜甫七绝,在宋绝为其实具有正宗的地位。同样,《千家诗选》与《千家诗》对中晚唐七绝的大量选入,也表现了江湖诗派对于七绝一体的判断标准,与前面的北宋人及后来的明清人对于七绝的判断标准大相径庭。从具体的效果来说,《千家诗选》消解盛唐正宗的绝句观念,对于准确的反映唐宋绝句的正宗审美趣味是有所偏差的。但是明人的盛唐正宗说的七绝体的判断标准也有它的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全面反映中唐之后绝句发展的成就,对于宋绝则差不多完全忽略了。如果将盛唐风神为宗的绝句艺术视

①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十四,第4004页。

②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百零一,第4221页。

为绝句体的“原质”的话,中唐以后的绝句艺术则是在这种“原质”的基础上的千变万化,从题材与风格两方面都做出丰富的发展,其中尚意理、内容上更趋于日常生活中审美情趣,则是其与盛唐绝句最大不同^①。我们可以看出,刘克庄以选录唐人五、七言绝句以切情诣理为标准,正是反映了中唐以后绝句艺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原本属于变体的杜甫的绝句,实际上已经由变体而转为正宗,成了造成宋绝与唐绝不同风格的又一种“原质”。杜甫绝句被《千家诗选》、《千家诗》所特别重视,正是七绝发展史中的这一过程的体现。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唐宋绝句艺术的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

《千家诗》共选七律四十八首,其中唐人二十五首,宋人二十一首,明人两首。这个比例,并且调查具体的选目,可知基本上还是以《千家诗选》为底本来选录。其中杜甫的七律,凡《千家诗选》选入的,本书多已选入。此外,《千家诗选》未选代表杜甫七律最高成就的《秋兴八首》,而《千家诗》则选入四首。从这个具体的差别,正可看出《千家诗》的编者与《千家诗选》的编者审美趣味的不同。《千家诗选》选择七律,也完全是以后期江湖诗派为标准。以意致清新、属对恰切、修辞条畅为特点,与传统所追求的气象高华、风骨劲健、兴寄浑融有明显的差异。杜甫七律风格极其多样化,但《千家诗选》所选杜诗诸作,还是体现江湖派的欣赏趣味,而《千家诗》的编者,则对传统的盛唐风格有所回复。但从选目来看,对《千家诗选》的继承还是很明显的。

《千家诗选》在五言选录方面的重大偏差,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如李白的诗歌,《千家诗选》今本《千家诗选》只选入两首,其中卷二十四五绝“花间一壶酒”,还是截其五古《月下独酌》中的四句而成。而卷十六“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下人”,其作者有杨亿、王禹偁、孟观等之异说,此书则署作王文公^②。这

样看来,本书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选李白的近体诗。李白诗歌是以古风、乐府见长的,轻视近体,但其五、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也有极高成就。刘克庄的《宋氏绝句诗》中强调他自己的选择标准是切情诣理之作,虽匹士寒女不弃,否则巨人作家不录。但他也补充说“唯李、杜当别论”。可见李白的五言绝句,刘氏是选录的,但此书则完全剔除李白。可见江湖后期诗风,在消解大家的过程,将李白也完全排斥在外了。《千家诗》的编者,则一反《千家诗选》的作法,在五绝、五律两体中,只选唐人,不录宋人之作。尤其是五律一体,完全以初盛唐五律为选择对象,下至中唐钱起、戴叔伦、韦应物等家,而被四灵宗法的晚唐姚、贾一派,也被完全删弃。可以说,是典型的明代复古派的五律选本。这也是因为《千家诗选》在五言选择上的巨大偏差,给了明代复古派以全面颠覆江湖诗派诗学观念的机会。

《千家诗选》、《千家诗》与江湖诗派的关系中,隐藏着许多的诗史方面的现象与脉络,值得深入研究。除了上面这些问题外,如理学与《千家诗选》、《千家诗》的关系,也折射出江湖诗派与理学的复杂关系。通常的看法,是认为四灵与江湖诗派是纠正诗歌创作中的理学风气为出发点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刘克庄本人也有类似的表达。但是,江湖诗派成员如刘克庄、戴复古等人,与理学、经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刘克庄与真德秀、林光朝、林希逸等学者关系密切。戴复古也推崇真德秀。戴复古甚至认为经学是本朝诗学的根本。推及永嘉四灵,也是处于陈傅良、叶适等儒学大家的学术背景之中。这种情况,使得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与当时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的关系,不可一言以断之。《千家诗选》选入大量程颢、朱熹、真德秀等人的诗,一直到《千家诗》中,理学家诗之多仍是其一大特点。

历史上的许多有比较独特主张、形成集团风
摇摇

① 关于中晚唐以后绝句发展中主“意”的倾向,刘青海《论中晚唐七绝句发展的趋势:徒诗艺术的扩张和深化》一文有比较具体的论述,《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汾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第388页。

格的文学流派,除了相关的理论表述^①之外,往往有相应的作品选本作为支持。比较为人熟知的,李攀龙的《唐诗选》之于前七子的复古诗派、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之于竟陵诗派,都属此类。比较的还有《玉台新咏》之于梁陈宫体诗派。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千家诗选》虽然尚

不能说完全代表江湖诗派诗学观点的一个选本,但其对研究江湖诗学的参考价值,同样是很重要。尤其是它以整个唐宋近体为选录对象,比起陈起的《江湖集》、《江湖小集》,更能体现江湖诗风的特点。因为后者只是本派成员的结集,不能直接反映江湖诗人的诗史观点。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lassified Anthology of Popular Chinese Poems* with Liu Kezhuang and Jianghu Poetic School

Qian Zhi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editor and the value of the book entitled *A Classified Anthology of Popular Chinese Poem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which was formerly inscribed as “compiled by Hou Cu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anthology and the six different selected works of four-lined poems (绝句)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ich were compiled by Liu Kezhuang, we can find that this anthology was based on the six selected works of popular poems compiled by Liu, which reflected the poetic thinking of Jianghu Poetic School in its later period. Its seven-character four-lined style was most influential upon its later generations of poets, and was mostly inherited by the anthologies of popular poems compiled in its later periods. This anthology can be regarded as a collective reconstruc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by the poetic circle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ose mainstream was Jianghu Poetic School. Therefore this anthology had it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in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poetry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of Song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Besides, we discussed some changes of Jianghu Poetic School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also pointe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thology and the poetic ideas of the four poets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Yongjia (永嘉四灵). In this article, we also discussed the poetic thinking of Liu Kezhuang.

Key words: *A Classified Anthology of Popular Chinese Poem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Liu Kezhuang (刘克庄), Jianghu Poetic School (江湖诗派), poem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摇摇郑摇园)

①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理论表述不像西方或现代的流派,以正式的宣言的形式出现。但不等于说没有他们的理论表述,其表述往往散见于各种文体中,如序跋、论诗诗、书简等,甚至包括史书传论。如《宋书谢灵运传论》就相当永明诗人的理论表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则是初盛唐复古诗学的纲领性文献。这些都是学者所熟知的。